

中国古陶瓷学会2025 年年会暨泉州“东方第一大港”海洋贸易陶瓷研讨会纪要

吕凌锋 郝柯羽

为深入挖掘“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文化遗产价值，推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研究，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应用，2025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国古陶瓷学会2025年年会暨泉州‘东方第一大港’海洋贸易陶瓷研讨会”在福建泉州召开，专家学者围绕泉州及福建地区古外销陶瓷的生产、运输、销售及其全球化影响展开深入交流。会议发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泉州地区窑业格局与生产技术

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羊泽林系统梳理泉州地区制瓷手工业分期，认为泉州制瓷手工业始于夏商原始窑（如苦寨坑窑），南朝至唐集中于南安、晋江沿海，北宋以南安、磁灶为中心，南宋转移至德化，明清盛行仿龙泉窑瓷及青花瓷。泉州窑业具有外销导向，市场适应性强，产品随需求演变，发展呈现从沿海向内陆转移的阶段性及地域不平衡性，凸显手工业的历史重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睿介绍了基于2019年—2022年泉州的考古发掘成果，提出以泉州古城为中心的窑业“三个同心圆”的分布模式：内圈（25公里内）为东门窑、磁灶窑等，产品多样；中圈（60公里—90公里）如同安窑，产绿釉青瓷；外圈（100公里以上）为德化窑，以青白瓷、白瓷为主。认为南宋正宗的消费需求与市舶司的海外贸易共同促进了区域手工业与物流体系的发展，推动泉州在宋元时期成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后马俊认为明清时期泉州制瓷业呈现明显阶段性：明早期生产仿龙泉青瓷，技术融合本土与龙泉窑要素；明中期转向青花瓷，受景德镇影响；明晚期形成安溪横室阶级窑与德化白瓷两支技术体系，响应海外市场需求；清初受漳州窑衰落影响，德化引入横室阶级窑转烧青花；清中晚期技术趋同，普遍采用横室阶级窑，装烧方式由垫饼向沙间隔演变。这一历程体现了沿海手工业对早期全球化市场的动态适应。

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张红兴介绍了2018年泉州东门窑的勘探成果，共发现7条分室龙窑及作坊遗迹。产品以粗胎青瓷为主，兼有青白瓷及少量釉下褐彩，装烧方式以叠烧、覆烧为主。认为东门窑年代为南宋至元，烧造技术源于景德镇、龙泉窑及磁州窑，与周边窑址存在技术交流。其产品以内销为主，外销规模有限，只在沉船上零星发现。

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陈冬珑认为，“马可·波罗瓷”是后世构建的文化标签，用以指代宋元时期经泉州港外销的特定陶瓷品类。研究结合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藏青白釉罐、南海一号沉船德化窑青白瓷等实物证据与《马可·波罗游记》文献记载，证实了泉州在宋元时期作为陶瓷生产与贸易集散中心的地位。其产品体系涵盖磁灶窑色釉瓷、德化窑青白瓷及同安窑珠光青瓷等，呈现出外销定制、标准化生产及跨文化适应的特点，体现了海洋贸易驱动下“产—运—销”一体化的产业格局与文明互鉴的全

球性影响。

海洋贸易体系与市场网络

福建博物院栗建安基于考古发掘资料，认为泉州出土宋元陶瓷源自本地磁灶窑、德化窑及福建其他窑口，兼有龙泉窑、耀州窑等标本。通过对比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等沉船出水陶瓷，论证泉州港在宋元时期作为陶瓷消费与集散中心，大量外销瓷器从此启航，成为泉州“宋元时期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物质基础，确立其在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中的关键地位。

福建省海丝外销瓷博物馆陈寅龙表示，浦城地处闽浙赣交界，宋元时期窑业（如碗窑背、大口窑）融合龙泉、景德镇等技术，产品经仙霞古道等陆路通道运抵泉州港外销。南宋真德秀等浦城籍官员主政泉州时推动海外贸易，进一步促进浦城瓷器出口。考古发现证实其青瓷、青白瓷见于日本、东南亚等地，反映了内陆窑场通过泉州港参与海洋贸易的产销体系。

景德镇陶瓷大学硕士研究生于永健通过对东南亚地区出土陶瓷的考察，结合文献，论证宋元时期中国海商在东南亚的贸易活动。研究表明，福建窑口瓷器广泛分布于越南、印尼等地，印证了以泉州港为枢纽的海洋贸易网络。出土器物铭文与商帮组织关联，揭示了民间商队的运营模式及商品的跨洋流通，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实证。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袁胜文团队认为宋元时期磁灶窑外销陶瓷可分为两个阶段：北宋中晚期至南宋早期以粗胎酱釉器为主，满足东南亚日常及宗教需求；南宋晚期至元代出现黄绿釉新品，器形纹饰更丰富，并针对伊斯兰化趋势生产细长流军持等定制器。通过类型学分析与海外遗址证据，揭示了该民窑依托泉州港，以实用性及适应性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产销策略，为海洋贸易史提供了重要案例。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赵闻瑾系统分析了宋元时期泉州城市功能与瓷器流通体系的互动关系。研究将遗址分为官署、文教祭祀、仓储码头及门户枢纽四类，揭示出三级供应体系：本地窑口（如磁灶窑、德化窑）满足日常需求，福建其他窑口提供多样化产品，全国民窑（如龙泉窑、景德镇窑）作为高端补充。窑业发展受晋江水系资源、外销导向及政策（如市舶司设立、南宋正宗司迁人）驱动，形成“产地—集散—出口”高效模式。泉州通过五条主要航线连接全球，实现了内外销协同，体现了宋元时期海洋贸易中心的集成能力。

福建博物院余慧君通过考古出土陶瓷探讨了元代泉州（刺桐城）的瓷器面貌与贸易体系。研究发现，元代瓷器普遍胎体厚重，釉色偏白并显乳浊，以磁灶窑黑釉瓷为代表，同时可见景德镇民窑青花等产品。瓷器来源包括本地生产、闽江流域输入及外省港口转运三类。泉州作为产销和中转枢纽，其瓷器组合在西亚、东南亚沉船中呈现稳定模式，体现了海洋贸易的成本考量与地域差异。《岛夷志略》记载泉州与98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元代延续宋制，

依托市舶司管理与港口优势，维持了“港城互动”的繁荣格局。

文化互动与跨区域影响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任志录认为南朝时期博山炉集中出现于福建地区，形成分布孤例。其形制以山峦型、莲花型为主，材质由汉代铜质转为青瓷，呈现简化趋势。这一现象与衣冠南渡密切相关：南迁士族以博山炉为礼制符号，标榜中原正统，维系汉代儒家传统。福建因此成为汉晋熏香文化的孑遗之地，并由此形成“南炉北坛”的丧葬习俗差异。该器物见证了南朝制度向隋唐的文化回流，是汉晋礼制传承的重要物质载体。

成都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博物馆伍秋鹏从文化因素角度分析了磁灶窑产品具有阶段性特征。南朝至五代时期，其产品在胎釉、器形及装烧工艺上与福州怀安窑高度相似，应归属于独立的“怀安窑系统”，而非传统认为的越窑仿制品。宋元时期，磁灶窑在保留本地特色基础上，广泛吸收越窑、龙泉窑等多地窑业技术，呈现出模仿与本地化并存的面貌。其产品在意形、釉色上虽与模仿对象相似，但胎釉质量及烧成温度存在差异，反映出技术吸收中的在地化改造，体现了“名实分离”的窑业现象。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陈扬分享了其对福建地区宋墓出土瓷器初步研究，认为其分布呈现“内陆多、沿海少”的特点，闽北、闽西为主要发现区域。墓葬瓷器可分为明器神煞（如堆塑瓶、谷仓罐）、饮食器（执壶、盏托、茶碗）及熏香陈设三类，兼具丧葬礼仪与日用功能。产地分析显示，随葬品包括北方名窑、景德镇青白瓷及福建本地窑场（如南平茶洋窑、三明中村窑）产品，反映了宋元时期福建与江西、浙江的文化交流，以及内陆丧葬传统与沿海窑业外销导向并存的区域特征。

本次研讨会成果丰硕，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冯小琦在学术总结中表示，专家学者通过多学科视角深入探讨了泉州古外销陶瓷的生产、运输及其全球影响，确认了泉州作为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在世界海洋贸易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因港兴窑”的产业带模式。同时，提出了以泉州古城为核心的“窑业同心圆”理论，明晰了不同层级的产品体系与地域经济整合。并且系统梳理了泉州制瓷业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的完整发展脉络。会议研讨还涉及沉船考古、科技检测等多方面内容。概而言之，本次研讨会借助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的深度交融，将泉州“东方第一大港”海洋贸易陶瓷研究由“现象描述”推进至“机制解析”阶段，逐步构建起能够反映以泉州为核心的海洋贸易动态演进的解释模型，最终达成对宋元时期中国全球化进程的精准阐释。期待将来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对泉州古代制瓷业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阐释：一是加强跨国、跨机构合作，构建海洋贸易陶瓷综合数据库；二是深化对贸易链条中商人、运输组织等“人”的因素的研究；三是推动学术成果的公众转化。

（作者单位：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泉州市文物局）

虢国铜壶

——青铜艺术的巅峰之美

辛刚刚 杨海青

铜壶是一种酒器，亦可作为盛水之用。《仪礼·聘礼》载“八壶设于西序”，注“酒尊也”。《周礼·挈壶氏》则云“掌挈壶以令军井”，注“盛水器也”。爰季良父壶铭曰“用盛旨酒”，伯随壶铭曰“用自作醴壶”。上述文献及铭文资料说明了铜壶在古代青铜礼器组合中的用途。《仪礼·少牢馈食礼》亦有记载，铜壶在西周时期的礼仪中用于盛放酒水，是不可或缺的礼器。20世纪90年代，在对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特别是铜壶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现择取其中的几件铜壶介绍如下：

虢仲铜圆壶



出自M2009虢仲墓，通高35.7厘米、盖高11.85厘米、口径12.9厘米、腹径21.3厘米、圈足直径18.2厘米。上有盖，盖顶有喇叭形握手，深子口。器身为母口，略微外撇，长束颈，颈部附一对半环形龙首耳，龙舌下弯衔一圆形环，垂腹，近平底，圈足。握手顶部饰龙纹，握手与圈足饰垂鳞纹，盖缘与颈下各饰一周“S”形凸目窃曲纹，颈上部饰波曲纹，龙首耳所衔扁环的正面饰一周凸弦纹，上腹部饰一周无珠重环纹，下腹部分饰二周“S”形无目窃曲纹，腹部纹样之间界以瓦垅纹。在盖口上与颈部内壁均铸有竖款排列的铭文，其内容、字数均相同，但字体、字形略有不同，自右至左共二行5字，即“虢中(仲)乍(作)旅壶”。

虢姜铜圆壶



系山西临汾警方破案移交，通高38.8厘米、盖高10.6厘米、口径13.8厘米、腹径22.6厘米、圈足直径19厘米。上有盖，盖顶有喇叭形握手，深子口。器身为母口，略外敞，方唇，长颈，颈部附一对称的龙首吐舌环形耳且各衔一圆形环，垂腹外鼓，近平底，高圈足。盖顶饰龙纹，握手处饰一周倒垂鳞纹，盖缘与颈部分别饰一周“S”形凸目窃曲纹，颈上部饰一周波曲纹，腹上部饰有珠重环纹，中部瓦垅纹之间为“S”形无目窃曲纹，圈足饰一周垂鳞纹。腹上部有补铸痕迹。盖子口外侧与器颈部内壁均铸有竖款排列的铭文，其内容、字数均相同，但字体、字形、行款略有不同。在盖子口外侧所铸铭文，自左至右、自上而下四行8字，即“虢姜乍(作)旅壶，永宝用”。在器颈部内壁所铸铭文，自左至右、自上而下共三行8字（字迹不清晰），即“虢姜乍(作)旅壶，永宝用”。

联羽纹铜圆壶



出自M2001虢季墓，通高39厘米、盖高6.8厘米、口径14厘米、腹径23.8厘米、圈足直径20厘米。上有盖，盖顶有喇叭形握手，盖子口较深。器身为母口，略微外撇，厚方唇，颈部细长，两侧装饰有羽翔如

生的龙首耳，龙舌自然下弯且衔着一个圆形环。腹部下垂，底部近乎平底，高圈足。盖的握手与器物圈足均饰垂鳞纹，盖面及器物下腹部饰以联羽纹，颈部饰简洁的波曲纹，上腹部环绕两周无珠重环纹。

重环纹铜圆壶



出自M2006孟姑墓，通高38厘米、盖高10.4厘米、口径13厘米、腹径23.6厘米、圈足直径19.4厘米。上有盖，盖顶有喇叭形握手，深子口。器身为母口，略微外撇，方唇，颈部附一对龙首耳，龙首双角耸立，龙舌下弯衔一圆形环，垂腹，高圈足。盖顶饰盘龙纹，握手与圈足则装饰有细腻的垂鳞纹，盖面环绕一周菱形方格纹，颈上部点缀波曲纹，颈下部则装饰一周“C”形无目窃曲纹，腹上部饰有二周有珠重环纹，而下部则饰一周变形云纹。

窃曲纹铜圆壶



出自M2011太子墓，通高37.4厘米、盖高8厘米、口径12.8厘米、腹径22.8厘米、圈足直径19.4厘米。上有盖，顶有围栏式握手，深子口。器敞口，长束颈，颈部附有半环形龙首双耳，垂腹，圈足。壶盖握手与器身圈足装饰着垂鳞纹，盖缘与器颈中部分别装饰“S”形平目窃曲纹和“S”形凸目窃曲纹，颈上部环绕着波曲纹，腹上部饰一周重环纹，腹中部饰瓦垅纹及两周无目窃曲纹。

虢季铜方壶



出自M2001虢季墓，通高49.5厘米、口长17.6厘米、口宽11.6厘米、腹长28厘米、腹宽18.5厘米、圈足长24厘米、圈足宽15.8厘米。上有盖，盖顶有长方形握手，深子口。器身为母口略外敞，方唇，长颈，颈部附一对称的长鼻龙首耳，龙舌下弯衔一圆形扁体环，垂腹，平底，高圈足。握手顶部饰以细雷纹衬地的“S”形凸目窃曲纹，握手与圈足饰斜角“C”形无目窃曲纹，盖面与颈下部各饰二组以细雷纹衬地的两两相对的前垂冠回首凤鸟纹，颈上部饰一周连作山峰状的三角“C”形无目窃曲纹，龙首耳所衔扁环的正面饰简易无珠重环纹，上下腹部各饰二组以细雷纹衬地的前垂冠凸目凤鸟纹，在上腹部者昂首相对，在下腹部者回首向背。在这四组凤鸟纹之间界以条带状凸栏线与菱形或三角形凸饰。在颈部内壁铸有竖款排列的铭文二行8字，自右至左为“虢季乍(作)宝壶，永宝用”。（下转7版）

本版责编：何 薇 王龙霄 甘婷婷

汉代龙虎图像镜及其社会含义

赵建鹏



九江市博物馆馆藏龙虎纹铜镜

化，龙从至高无上的图腾神变为被权力镇压的走兽。从西汉晚期起，龙形象表现出由上而下的普及，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普通大众，都希望借助龙的神力而得以达到升仙的愿望。东汉时，以阴阳五行、灾异祥瑞为中心的谶纬逐步渗透，龙被视为瑞的象征，吉兆与辟邪功能日益凸显，成为东汉以后两千年来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神兽。

虎是现实动物，虎性凶猛，在一定的思想语境下被人主观赋予其神性。早在远古时期，就出现虎图腾，产生了对虎的崇拜。先秦时期的人已注意到虎的勇猛特质，《尚书·牧誓》“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即把勇猛之士称作“虎贲”，《礼记·曲礼》“又王门则画虎以示勇守”，虎符节、虎形钮印等实物，印证虎被借用到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以作为权力、勇猛或神性的象征。汉代多为写实虎纹，躯体四肢清晰，虎纹形态逼真生动。东汉早期出现了在写实虎上添加飞翼，与仙人组合，表达了汉代人升仙的愿望。东汉以后受阴阳五行与谶纬观影响，虎逐渐衍生成一种符应，并带有辟邪驱鬼的功能，《焦氏易林》载“切切

之患，凶重忧荐，为虎所吞。”

铜镜中龙虎图像的含义

上述是龙、虎形象作为单一图像在两汉时期的社会含义。成对出现的龙虎形象，其彼此间是存在对照和呼应关系的，除了保留有单一图像含义外，龙虎图像在汉代有其较为特定的社会含义。

升仙、长生不死的想象。其一源自对西王母的信仰。西王母与龙虎图像的固定匹配在汉代四川地区极为广泛，有学者将龙虎视为西王母的陪伴和守护者，或是西王母左右的组成部分，即构成完整西王母的有机体。《焦氏易林》中记载“驾龙骑虎，周遍天下，为人所使，西见王母。不忧不殆。”龙虎作为主神西王母的坐骑，是西王母的象征，这一图形在铜镜中的使用，表达了汉代人升仙的愿望。其二在汉画像中龙虎是较常见的对应物，龙虎相对代表东西相对、阴阳相对，来象征阴阳二气，还出现了龙虎交媾镜，反映的是汉代盛行的阴阳合气、龙虎交媾结成丹信仰和仪轨，以追求成为长生不死之仙。

吉兆、辟邪的世俗化愿望。龙、虎图像组合在阴阳五行与谶纬思想中，龙被归为祥瑞，其吉兆与辟邪寓意愈发凸显，虎因其勇猛、威力无穷而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力量，进而被神化，成了辟邪通天的神物。镜铭中有“左龙右虎辟不羊”“仓龙在左，白虎在右，辟去不阳宜占市，长宜君亲利孙子”“左龙右虎辟不阳，长富乐未央”等等，镜铭文已将龙虎图像镜组合的作用说得很清楚，即辟邪除凶，成为社会民众的普遍追求。

龙虎图像镜是生活用品，是汉代铜镜中较为特别的一类，龙虎图像及镜铭反映的是汉代社会尤其是东汉人们追求升仙、长生以及阴阳五行、谶纬观影响下的祥瑞灵兽庇祐、避灾异、求吉兆的愿望，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精神追求，突显其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九江市博物馆）

龙虎图像组合是汉代纹饰中较常见的表现形式，在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彩绘陶器、铜器、雕塑中都有出现。九江市博物馆馆藏汉代铜镜中有一类以龙虎为主题纹饰的铜镜，圆形，圆钮，内区一龙一虎夹钮相对峙，呈现浮雕状，龙虎嘴部张开，彼此注视对峙。三角锯齿纹缘。此类铜镜大致在东汉时期开始流行，龙虎的形象与当时社会的宇宙观、生死观以及阴阳五行、升仙、谶纬等思想等有关。

铜镜中的龙虎图像

龙虎图像作为铜镜纹饰从东汉时开始流行，尤以当时会稽郡、吴郡铸造的铜镜为代表。孔祥星等编著的《中国铜镜图典》收录了不同类型的龙虎镜。根据现有的资料，汉代龙虎镜大致有二龙二虎对峙镜、二龙一虎对峙镜，一龙一虎对峙镜、单一主题龙或虎镜等，可以看出这一类铜镜以龙、虎为主题纹饰，搭配以禽鸟、瑞兽、羽人等，形成不同的纹饰组合。

汉代龙虎图像

龙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是由人类幻想出来并赋予其神性的动物。汉代以前，龙的形象比较模糊，龙形图像变化多样，不固定。汉代龙的形象空前活跃，龙的纹饰见于不同的载体，比如砖、瓦、铜、石、玉等。《说文·龙部》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王充《论衡·龙虚篇》载“龙之所以成形者，以能屈伸其体，存亡其形”“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这些汉代文献中记载的龙形象，体现了汉代人对龙的认识。《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龙形象与国家最高统治者紧密联系，龙的地位也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点在西汉早中期的丧葬制度及活动中得到体现，龙题材作为较高等级身份的象征，造型精美且有一定的规制。西汉中后期，龙题材发生了重大变